

上海师范大学李时人教授(1949-2018)年初去世,得年仅69岁,很感意外,伤悼弥深。李先生从徐州师院调到上海工作,因为都作唐代文学研究,有接触,说不上密切。记忆中,较具体的接触有两次。

一次在上世纪90年代中后期,曾到他工作室深谈,听他说《全唐五代小说》的编纂构想和选择原则,记得其间谈到南开大学李剑国先生《唐五代志怪传奇叙录》之成就,及他的新著如何有新的突破。《全唐五代小说》后来由三秦出版社出版,他曾寄赠一套给我。此书参考何满子先生对唐人小说之界定,以具完整故事与人生寓意者为正编100卷,以不合此格仅稍具始末者为外编25卷。我对此原则稍有保留,但确认是一部校订认真、编次允洽的高水平著作。他曾考证《大唐三藏取经诗话》出于唐末,与王国维元代说不同,我也不尽赞同。第二次大约是在2001年秋,他约我去给他的研究生讲一次课,说到近期工作,他告诉我已经接受中华书局约稿,编纂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的《明代卷》。此书之《唐五代卷》,我执笔约2000则,近全书之半,理解编纂体例与学术追求,明代存世典籍与唐五代文献之存世数,至少有几十倍的增加,个人完全不可能读完,工作量之大,即便一个专门研究明代文学的研究所全力以赴,也得许多年方能有成。我将困惑说出,李先生平淡地说他将个人承担,实施办法是所带每位研究生的学位论文选题,皆作明代分地域文学家研究,藉此为全书积累文献。并告坚持多年,应该可以完成。

此后10多年,因参加会议或项目评审,有过几次接触,但多未深谈。各忙各的,他转治明代,走到了另一个领域,我也无从过问。直到噩耗传来。他的得病始末,我至今仍不了解。近日看到出版不

濠上漫与

摸清明代文学的家底

■ 陈尚君

久的《明代卷》(中华书局2018年1月版),极感震撼,此书所达到的学术成就,足以代表当代中国文史之学的高水平。我愿将自己稍作翻检的感受传达给读者。

《中国文学家大辞典》的选题,1984年由中华书局编辑部提出,以科学性和实用性为原则,既求收录完备,突破前此类似书以正史《艺文志》《文苑传》立目的局限,博采总集、别集、笔记、方志、金石等书,又要求对作家生平和著述作扎实的考辨和判断,力戒主观片面。约稿很快落实。1986年,我初识《唐五代卷》(中华书局1992年10月版)主编、厦门大学周祖谟先生,他约我参加,但初拟条目多已约出,仅余少数事迹不明者。周先生信任我,允许我任意增补,我在1989年前后撰稿2000条,条数占全书之半,篇幅约为三之一,大多为首次揭出。前后各卷陆续出版,以我之肤浅好胜,常庆幸自己参与这部分的水平似乎一时还难超过。没想到25年后,在压卷之著中看到了真正的优胜。

明王朝立国277年,并不比唐王朝长,但存世文献数量之多,远远超过。《全宋诗》初编出来,存诗大约是《全唐诗》的五倍。越晚近,越成几何级数般增长。中华书



李时人教授

局这套书之规定,宋以前求全备,若唐代作者有一句诗残存,有一部与文学相关书,无论存佚,皆为列条。宋以后各朝仅有选择地收录3000人左右的重要作者,无法全备。《明代卷》总收条目为3046人,并不比《唐五代卷》多,但如何确定这份名单,则可见李时人的求实精神。在《前言》中,他说至今没有明代全部作品的完整结集,最重要的几部通代选集,《列朝诗集》收诗人1743家,《明诗综》收3155家,两书当然影响很大,但《皇明诗统》收万历前作者1871人,有526家不见前二书。此外,收录明诗的明清两代地方总集有400多种,新见作者人数更多。他估计明代有诗文存世作者至少有二万人(我推测远过此数)。他的另一选择立场是对明人著录与存世别集之调查。他分析明清各种书目,认为记录最丰富的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别集即达5207家。至于存世明人别集,他充分利用中外著录,初步估计有

3300家,其中一见于《千顷堂书目》著录者为1734家。此一统计显示,明人别集存亡总数当在万种左右。近代以来文学观念转变,以戏曲、小说为主的通俗文学进入主流视野,加上别集以外之各类文学写作,这又是何等巨大的数量。在两万多作者中,根据对“作家的文学成就,包括创作和影响等各方面考量”后遴选出3000多人。《凡例》更说明文学史上出现过并称或结社,无作品存世或影响不显著者不收,界定很严格。

《明代卷》所记内容,包括生平仕履、文学活动、著述及成就评价各项,最后交待文献取资。前人虽然有明人传记资料索引之类工具书,李时人显然不满足于于此。他坚守的原则,一是务求穷尽地搜集传记文献,二是存世诗文书目,三是前人之研究,包括当代之大量学位论文,皆予披检。完成之文本,每位作者生平仕履之叙述,皆如年谱般地务求将字号、乡里、科第、履历及各方面成就与评价,作客观冷静之叙述,从而将明代文学所有的家底和细节全部给以传达。

我以前曾说过,唐代居百代之中,文献多少适宜,学人穷毕生之力可以读完,《唐五代卷》编写

的难度多如大海捞针,需集腋成裘。《明代卷》就完全不同了,存世典籍之浩瀚繁博,远超想象,一些大作家如王世贞个人著作即达近千万字,何况还有大量散在天涯海涘,未经刊布整理者。李时人悬出上述高格,每一处细节都需要海量文献之甄比归纳,再加他一人独任全书之撰写,真惊叹他的执着坚毅。《前言》所述他的执行方法,一是对所有刊布典籍和相关研究不留子遗的充分阅读参考,二是在10多年间,指导的研究生分地域地做明代作家研究,或以省为单位,文化大省甚至以州府为单位,包括作家、家族、结社等专题,有博士论文20多篇和硕士论文40多篇,辅助做前期的文献工作,这些论文对作家生平和存世别集,都充分利用地方文献作了稽考。如浙江存明别集,因此而得知宁波有88部,嘉兴49部,金华63部,等等。他在此基础上撰写,得以浓缩菁华,谨慎而准确的记录,有分寸地评价,虽为辞书,足以优人当代学术之林。

此书之创见,我在最初见书局微信推罗贯中条目,将元明之际杂剧作者与嘉靖后《三国》小说之署名作者,分开叙述,后者且有各本小说之署名记录,顿感新意纷呈。再检我所关心过的一些作者,也多前未知之事实。

偶遇本校治明代文学的郑利华教授,说到对李先生的印象,觉得北方人敦实诚朴,待人率真,勇于进取,不畏艰难,对他的所为充满敬意。我不知道李先生生前有未看到全书的出版,但我能够体会,以学术为生命的学者,能有一部或几部足以长留天地间的书,他的一生是精彩、充实而幸福的。

谨述此文表达我对李时人先生的敬意。

(上接第一版)

所以你能看到,他所有的论文不仅视角非常独特,且如桂林一枝,昆山片玉,特别能以小博大,于不经意间开辟出一个宏大幽邃的世界。集中《王维“雪中芭蕉”寓意蠹测》写得最早,其细微处透露的精华,已显示了将要到来的他鲜明的学术个性。

此后,如《论唐代寺庙壁画对韩愈诗歌的影响》,由《韩昌黎诗集》多写寺庙壁画,而及韩愈各体文创作对鬼神动物画、地狱变相和曼荼罗画的容受,不仅揭出韩愈这部分美感经验的特殊来源,更开显出反佛不遗余力的诗人所实际拥有的精神世界的另一个侧面。他据此总括性地指出,“诗人对壁画的欣赏之富,从进一步的意义上说,乃是一种深入渗透到他诗歌创作中间的内在的联系,也是一种体现着画与诗两种不同艺术之间的相通相生的关系”,正是横向研究和多门学科的交叉研究的成功范例。至于过程中既有对佛教教义大本大宗的提示,又能结合具体的物象事象,如火、莲花、颓胸的菩萨、庄严的金刚护法乃至行刑的场景,展开有关韩愈诗歌特殊的构思、意象,以及中唐后流行的尚怪诗风的分析,则不仅可以见出他对佛经文学与佛教文学的精熟,更反映了他对诗歌发展大时段的精准把握和精细化深描功力,已达到了炉火纯青的程度。正是感受着上述多重的阅读快感,我们不能不说,拿“深思敏悟,出神入化”这八个字来指称他自己的研究趣尚是再也贴切不过

了的。当然,从这些论文中,我们也读得出他对从丹纳、朗松、弗洛伊德到同时代李泽厚的借鉴。他从来不愿亦步亦趋地追奉流行,但也决不迷恋骸骨,抱守残缺。如此不戾于古而违于时,又无屈于旧而昧于新,多方采获,衡于一心,终于使得他的研究别开一堂,并自居面目,卓然成家。

治学境界:融通而多方的全面观照

最后要说这部分论文所呈现的允吉先生的治学境界。个人看来,绝不囿于一枝一节的小考证,而更指向关乎全局的大判断。唯此,每篇文章在讨论关键问题的前后,总会前有长短不等的引论,后有要言不烦的生发。有的辞甚富丽,甚至触及中外文明与文学比较等绝大的问题。这让人不由得想到清人金圣叹点评《西厢记》“前候”一折所揭櫫的“那辗”一词。他称“凡作文必有其题……而总之题则有其前,则有其后,则有其中间。抑不宁唯是已也。且有其前之前,且有其后之后,且有其前之后,而尚非中间,而犹为中间之前;且有其后之前,而既非中间,而己为中间之后,此真不可以不致察也”。又说“题固急,而吾文乃甚悠扬也。如不知题之有前有后,有诸迤邐。而一发遂取其中间,此譬之以概击石,确然一声,则遽已耳,更不能有其余响也”。须指出,尽管允吉先生素重辞章与义理、考据并举,行文晓畅而不失温

雅,但对他文章中所体现的这种前拓后展的写法,仅从辞章角度论绝对是不够的,它实际上反映了允吉先生意欲广泛收罗史实,全面罩摄论题的学术雄心。昔梁启超在《中国历史研究法》一书中曾提出著名的“史网说”,意在揭示并非单一意愿造成的人类活动的历史真相。允吉先生则将此意表述为“融通而多方面的全面观照”。据此可知,从上世纪80年代方法论大讨论中走过来的他,深知微观必须与宏观相统一才更具价值、魅力甚至境界。他将此视作治学的高境,虽无意建起大纛,也从生硬地拉扯西方的理论以裁量中国的文学,对不带水土地移中就西更抱有深刻的警惕,但还是能审微见远,并由此收以一总万之功,原是植基与个人更广远的追求,属意在看得到风景的更广阔的通径。

也因此,他的这些论文写得特别通达有“景深”,特别能提供人进一步思考与生发的空间。他的《佛像之踪迹与审美》一文不常为人谈到,但个人三读之后仍不能自己,看到的似高士轻衣陵冈,当风指点,视野之开阔与持论之精切,已然达到非常醇熟的境界。而志意蹈举,情味婉转,尤其让人拜服。更让人拜服的当然是在答记者问时,他对佛教影响中国文学的途径,从时空观念到行文结构等八个方面所作的精辟提示。这八个方向,在他后来的研究中,有的假新材料的发现和新的问题意识,有了更精彩的呈现。如收入《佛教与中国文学论稿》中的《中古七言诗体的发展与佛偈翻

译》一文之由东汉支娄迦讖一直到刘宋求那跋陀罗所译经本,论证早期汉译佛典中数量众多的七言偈在中土流布过程中,对七言诗形式结构有旁助之功;再如《王维〈鹿柴〉诗与大乘中道观》一文之由《鹿柴》诗偏从有声色处写空山的思辨论表和图像象征手法,结合其《荐福寺光师房花药诗序》所谓“心舍于有无,眼界于色空,皆幻也,离亦幻也”,论证大乘中道观对诗人的辘川诗创作有深刻影响,等等,都可谓慧眼独照,言前人所未及言。而衡之以学界不断刊布的新成果,有从主体、题材和想象(此亦可易以母题或类型等西方名词)入手的;也有从佛经翻译对语言、体裁乃或创作方法的影响展开讨论,它们在大方向上,很少有超乎上述八个方向之外的。这又不能不让人钦佩他识量的高卓。

如今,允吉先生已过杖朝之年,但精神依然矍铄,思维言谈还是像过去一样敏捷,此诚道能济寿,学能养人。当然,毕竟高龄的关系,现在他已很少作研究了。他说老年人应该过一种简单而重复的生活,这样的见道之言是奔竞中人所无法感会的,也是先生高过许多人的地方。每个人都会在生命中遇到许多人,并承担一些事情,但不是每个人都能够得少时的善辩无畏与盛年的善思无疆,俱化为晚年的安熙无求。而这些,允吉先生都做到了。故值此《唐音佛教辨思录》修订本新出之际,谨作小文为贺,是要发扬先生的精神,进而广大吾复旦中文系历久不衰的传统。